



老庄与 中国现代文学

雷文学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016002561

老庄与 中国现代文学

雷文学 著

人 民 文 学 社

责任编辑:詹素娟

封面设计:彭世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庄与中国现代文学/雷文学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9

ISBN 978 - 7 - 01 - 015241 - 7

I. ①老… II. ①雷… III. ①道家—哲学思想—关系—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B223. 05②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2088 号

老庄与中国现代文学

LAOZHUANG YU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雷文学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5

字数:335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5241 - 7 定价:5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作家对老庄的三种态度》
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3BZW143

序

中文系的本科生，全部从旗山迁回仓山老校区了。当初迁往新校区，舍不得老校区；现在对新校区却又有些留恋了。福州素有“左旗右鼓”之称，鼓，即鼓山；旗，就是旗山，旗山在乌龙江南岸。如果不是太赶时间，上课前早个二十来分钟到达新校区，恰好碰上空山雨后，青山如洗，白云绕舞，“逶迤飞动，如旗之风靡”，此即旗山也！一时神情大为清爽。就人文言之，溪源江水紧贴校园而过，沿溪上溯，有溪源宫。乌龙江岸，有旧侯官市，“庙踞鼋鼍石，神依土木丛”；“日泻帆光澹，江澄塔影寒”，遗迹犹然可寻。明朝林春泽，居旗山北屿，历成、弘、正、嘉、隆、万六朝，正德进士，活了一百又四岁，有集曰《人瑞集》，子嗣后人，多有文名且长寿；瓜瓞连绵，五六百年来，水西林一直聚族而居。

老校区，又称仓山校区。仓山，即藤山，古名瓜藤山，后贩盐者割为私仓，遂称仓山，其名沿用至今。藤山，在闽江南岸，西起上渡，东至中洲，连绵五里，以其地多种瓜，瓜有藤，故名。藤山北岭，旧有天宁寺，南宋李纲谪居于寺之松风堂。明代藤山人周仕阶，嘉靖举人，仰慕李纲为人，自号天宁居士，其诗集名《周天宁先生诗选》。其子之夔，崇祯进士，重修松风堂，入清不仕，有《弃草集》。藤山北望，一水之隔，有晚清林纾的苍霞精舍。藤山南麓，旧时岁杪，郡人载酒来游，人称梅坞。“藤山梅万树，冬尽一齐开”；“十里花为市，千家玉作林”，此明代文人咏藤山梅之诗也。福州开埠之后，梅坞徒存其名，代之而起的是教堂错绣，领事馆比肩而立，“千门万户，抗云蔽日，塔如、厨如、青白缭错而下”。民初，国民政府前主席林森先生曾就读于英华学校，风风雨雨，如今林公馆修缮一新，青砖瓦舍，掩映于高楼之中，也是藤山的一道风景。

予生也晚,不及亲历 20 世纪 50 年代的院校调整,自然也没有见到福建师范大学在藤山山麓挂牌的盛况。青砖学生宿舍,地板嘎吱作响的筒子楼,通往音乐系的小木屋,遗世独立似的教工之家,短道游泳池,已经无处寻觅。毕业几十年的校友回到母校,总是千方百计想在校园中寻找过去的那些记忆,你可以指着两座八层楼高的研究生宿舍对他说,这个地方就是您住过的青砖楼,还是叫十四、十五号楼,记忆与现实,两者之间还有着些许的联系;但是,当您兴冲冲去寻找短道泳池,路径找不到了,即使有识途的老马领着您去指认,面对建筑群,您只能茫茫然不知说啥是好。

建筑传统可能有中断,这对一所学校似乎关系不是特别大。况且,老校区的标志性建筑,如老华南建筑群还在,老音乐系建筑群也还在。比起建筑,一所大学、一个院系,文化学术传统的承传要重要得多。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近期集中推出三套丛书,其中两套分别以两位学科奠基人,也是建国以来的第一、第二任系主任黄寿祺先生、俞元桂先生的斋名——六庵、桂堂命名,用意了然;另一套取名“藤山”,似也有看重文化积淀、学术承传之意。

黄寿祺先生、俞元桂先生的道德文章,其他两套书的序言都有精辟介绍,兹不赘。说起老中文系的旧事,我曾经在《听彭一万讲五十年前事》略有述及,彭先生知道的比我多,体会也比我深刻。我这里要补充的是一件旧事,一件近事。

十五年前,我编光泽高澍然《抑快轩文集》,偶然接触到黄曾樾教授(1898—1966)的生平著述。20 世纪 20 年代,黄先生在福州文儒坊拜石遗老人为师,治诗古文,石遗老人每有讲授,黄先生退而录之,结为《谈艺录》一书出版,30 年代中华书局已经印了 3 版。石遗老人论闽古文家,首推朱仕琇,高澍然次之。朱氏有《梅崖居士文集》传世,而高氏古文尚无刻本。黄先生不忘师训,十多年间,不断搜集高澍然古文 160 多篇。黄先生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1943 年,福建省政府迁至永安,黄先生供职驿政,也到了永安。日机空袭山城,“每遇警报,挟册而行”,就是说,每当空袭,黄先生随身带的就是他搜集到的高氏之文。黄先生又想,万一躲不过空袭,人亡稿毁,挟册而行,并非上策。先生遂于 1944 年将高氏古文编成《抑快轩文集》上下两卷,自费在永安印行,公诸于世。

一件近事,前年,福建文史馆馆长卢美松先生同时馈赠两部文集。一部是包树棠先生的《汀州艺文志》(方志出版社 2010 年版),另一部是郑宝谦先生的《福

建省旧方志综录》(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两位先生都曾任教于福建师范大学或它的前身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两书都有卢馆长作的《序》。

包树棠(1900—1981),福建上杭人。著《汀州艺文志》,六十万字,为研究汀州文化、艺文不可或缺的著作。包先生早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国文系代办之集美国学专门学校,建国之后为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直至退休。《汀州艺文志》动手于1925年,完成于1930年,为其少作,除了《自序》一文发表在1930年《厦大周刊》上,全书生前未曾刊布。

郑宝谦(1938—2014),福建福州人。郑先生先就读于厦门大学化学系,后转入外文系,先后任教于福建农学院、华侨大学,1973年之后到福建师范大学任教。大家知道郑先生曾任教于历史系,然而,据《福建省旧方志综录》作者介绍,先生还曾在中文系任过教,看到这一介绍,让人汗颜,我们对中文系的历史了解实在太少。《福建省旧方志综录》皇皇一百四十万字,其学术价值,金云铭、黄寿祺、熊德基诸前辈言之详矣。《福建省旧方志综录》出版不到四年,郑先生今夏在孤独中溘然长逝,不觉为之唏嘘。

这两件旧事、近事,都和中文系的学术传统有关。黄曾樾先生获得国外博士学位之后,仍然不忘师训,一直念叨着他的老师,继续搜集研究高澍然的古文,难能可贵。老师所说的话,不一定都对,学生固然可以另辟蹊径,但是老师有益的教诲,学生可能会受用一辈子,我自己便很有体会。包树棠教授,毕业于“国专”,在强调学历学位的今天,“国专”,算什么层次?其实,身份不一定都那么重要,《汀州艺文志》1930年完成,2010年出版,书稿完成时包先生还是一位年轻学人。时光已经走过了八十年,出版距离先生谢世也已经三十年!一部浮浮躁躁而产生的所谓著作,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吗?郑先生的生活是孤独的,学术也是孤独的。《福建省旧方志综录》的作者介绍,没有职称,似有为智者“藏拙”之嫌,其实公开介绍郑先生是副教授,又有何妨?一位副教授,用二三十年的时间,写出可以传诸于后人的著作,我们这些有幸忝列教授行列的教师,难道不应该更加努力,在学术上更高地要求自己,免得后人指指戳戳吗?

收入本套丛书的作者有:黄黎星、余岱宗、陈卫、吕若涵、郭洪雷、郗文倩、刘海燕、雷文学、周云龙等,年龄都在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都具有博士学位、高职称。本丛书的作者都是我的朋友,当我一一写出他们的名字时,他们的音容笑貌跃然于

我的眼前。比起刚毕业不久的博士，他们的学术已经成熟，有比较丰富的积累；比起六十边上或更老的“老教师”，他们则更有活力和创造力，思维敏捷，出手快。他们是文学院各学科的中坚，承上启下；文学院的将来，首先靠的也是他们。文学院一下推出三套丛书，可能是出于作者归类的方便。何况，我上文说过，教授的论著，不一定就一定比副教授高明；同样，不是博导的教师，也可能写出比博导好的论著。收入这套丛书的著作，我虽然未能全部读完，但可以肯定，大家都非常优秀，在各自研究的领域已经做出成绩。随手举一个例子，郗文倩著作中“鱼龙曼戏”一章，即便我能写得出来，恐怕也不会如此精彩。文倩研究的领域我比较熟悉，故举以为例；其他几位的著作，也许更为突出也未可知。我强调遵从师训、学术承传，但也相信，中青年学人，一定会做得比前人、比老师更好，这样，学术才会进步。

本丛书的作者，都已经不是只出过第一本书的“新人”了，收入这套丛书的著作可能是他们的第二本、第三甚至第四本了，长足的进步，说明文学院很有希望。2012年，中国内地出版的新书达40万种之多，2013年44万种，在出版如此繁荣的状况下，一本新书要超凡出众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包树棠先生的《汀州艺文志》、郑宝谦先生的《福建省旧方志综录》都足以传世。本丛书的作者（当然还有我自己）都得严肃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写出一部传世之作？包先生的《汀州艺文志》是在完成八十年之后才得以出版的。比起包先生，我们幸运得多，出本书似乎不太难，但是，八十年之后，人们是否还能记得我们今天出版的这部书？假如有人读我们这部书，会有什么反映和评价？我想，如果这套丛书有若干种足以传世，还能得到读者的肯定和较好的评价，那么我的序也就可以附之而不朽了，甚幸！

汉代，藤山草莱未辟，直到晚唐，此地方有民居。如今闾阎扑地，歌吹沸天，已为福州一大奥区。文学院将本丛书名为《藤山述林》，如前所述，取名很有文化意蕴。文学院本科生都从旗山迁回来了，假如本科生不回迁，却把研究生也迁过去，丛书该叫什么名字？如果让我说，那就叫“旗山述林”吧！谁又能保证，文学院不会再有迁往旗山的那一天？其实，旗山也很不错，那里空气好，山青水绿。

陈庆元

公元2014年8月24日于藤山华庐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导论 现代作家对老庄的三种态度

- 现代作家对老庄的批判 / 3
- 现代作家对老庄的继承 / 12
- 现代作家对老庄的发展 / 20

第一章 晚清文学与老庄：老庄思想向现代的过渡

- 严复：会通中西 以为时用 / 39
- 王国维：解脱悲剧人生 / 52
- 梁启超：无为无不为 / 67

第二章 启蒙救亡与老庄批判：老庄与现代作家思想之一

- 鲁迅：意志哲学和时代要求的双重变奏 / 87
- 郭沫若：时代旗帜下的赞扬和批判 / 100
- 陈独秀、胡适对老庄的批判 / 113
- 闻一多：书斋里的颂歌 硝烟里的批判 / 121

第三章 文化再造与老庄回归：老庄与现代作家思想之二

- 林语堂：生存哲学——老庄哲学的现代转化 / 143
- 林同济：回归之路——从尼采到老庄 / 155

第四章 自然人性 本真生命:老庄与现代文学创作之一

废名:天大于人 / 173

沈从文:契合自然的人性 / 182

许地山:超越命运之苦与求真适性 / 197

徐志摩:赤子情怀 自然性灵 / 206

第五章 隐逸情调 平淡性情:老庄与现代文学创作之二

周作人:人情物理寄苦生 / 219

林语堂:幽默、闲适、性灵 / 233

梁实秋:从人文主义到个人主义 / 241

第六章 宇宙之境 天地大美:老庄与现代文学创作之三

毛泽东:身执此世 神游天外 / 253

郭沫若:雄肆汪洋 泛神大美 / 264

宗白华:小诗大境 悠游宇宙 / 269

第七章 老庄与现代文学文体形式

老庄与现代纯诗 / 279

老庄与现代小品散文 / 294

老庄与现代诗化小说 / 312

参考书目 / 327

后记 / 334

导论

现代作家对老庄的 三种态度

2 老庄与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上是一个重要而特别的阶段。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从倍受压迫和欺凌到走向独立,从被动挨打和被动接触西方社会,到主动走出去,其间民族心理经受巨大的煎熬和转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中国现代文学,也有了不同于以往的中国古代文学的特点。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中国现代作家们不仅学习西方文学的技法,更注重西方文学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不仅学习西方的文学,更研究包裹着文学的种种意识形态:政治、宗教、哲学、艺术等等。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仅对照西方文化的优势反思和批判了传统,而且在中西文化的深入比较中也敏感地觉察到西方文化的缺陷,并表达了以中国文化的优势去弥补这一缺陷的愿望。一方面,传统文化在总体上被质疑造成中国人懦弱、保守、自私、残忍、敷衍、玩世的国民性,从而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另一方面,人们也觉察到传统文化的某种合理性;尤其是,由于几千年民族心理的巨大惯性,人们一方面批判传统,一方面又摆脱不了传统的思维模式,摆脱不了对传统的情感。现代作家一方面高呼西方文化,然而当种种西方文化形式在中国落地生根,成长出的却未必是纯粹的西方文化幼苗。所有的这一切,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在走向西化的过程中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景观。中国文学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化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嬗变中实现的。

在这一过程中,中外各种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一问题近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比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象征主义、科学主义等思想潮流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均受到注意。而曾经在古代文学中起过很大作用的老庄思想此时又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并可能对中国文学的未来走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研究老庄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可以抓住一个要害,即作家的心态:在老庄的影响下的现代文学无论表现出多么复杂的形态,都可以在作家的心态里找到问题的答案。本文化繁就简,将这种心态归结为批判、接受和发展三个方面。从逻辑上讲,这种归纳是全面的,可避免遗珠之憾,而又达到一种以简驭繁的效果:批判老庄主要从思想上、政治上展开,这种批判既有改造民族命运的功利目的,又有哲学理念的考量。接受老庄主要从个人的生活修养到艺术观念等方面,这种接受又表现了丰富的内容和不同的侧面。发展老庄思想主要是针对现代人生和现代观念出现的问题,尝试用老庄清静、自然、无目的性的观念去解决,他们的努力从生存的层面到形而上的层面展开,且均有可观的表现。

现代作家对老庄的批判

现代作家对老庄的反思和批判是在西学的背景下进行的。现代文学作为现代文化的一部分,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无论是个人主义、民主主义、进化论、科学主义、生命哲学还是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派,甚至颓废派,其中有一个主旋律,就是对自我生命意志的肯定,对形而上精神的不竭追问。这种可贵的传统在中国文化中是缺失的。在为君、为民、为天、为道(总之是为他)所压抑了几千年的中国人,一旦从西方文化中获得这屡曙光,其欣喜应可想而知(这缕曙光曾在印度产生了泰戈尔虽神秘却充满生命气息的诗歌)。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民族危亡下接受西方思想的,现代作家在从事文学活动之时已先天地肩负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使命;而且,按照李泽厚先生的看法,近代史上急剧变化的社会,使“思想启蒙”主题让位于“民族救亡”主题。^①在这种现实压力下从事启蒙的现代文学巨子们,其峻急的心态概不可免,因而其愤懑多于欣喜,沉重多于希望,诅咒多于歌颂。老庄思想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最先开始对老庄持系统深入地批判的作家是早期的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即深入思考了民族危机的文化根源和解决之道。来自欧洲的一批“摩罗”诗人吸引了他的目光,他欣赏那些“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战士,期望凭借这些充满力量和反抗精神的精神界战士唤起国人的战斗

^① 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编:《胡适研究》第二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精神,振奋民族精神,实现民族自强,改变民族命运。而要实现这一点,就要改变与这种摩罗精神相对立的民族精神——那种消极无为的传统文化,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鲁迅展开了他的道家文化批判。

在《摩罗诗力说》中,针对中国的“爱智之士”对往古社会的赞美,鲁迅指出,往古社会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万祸不作,人安其天”,事实是“古民曼衍播迁,其为争抗劬劳,纵不厉于今,而视今必无所减”。因而他们对古代社会的描绘只是一种不得已的妄想,因为“作此念者,为无希望,为无上征,为无努力”,只好“脱屣尘埃,惝恍古国,任人群墮于虫兽,而已身以隐逸终”。他们的代言人无疑是老子:

老子之辈,盖其枭雄。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

这种理想,鲁迅指出,虽“其术善也”,但难以适应现代“进化如飞矢”的社会。

五四以后,鲁迅在一系列有关现实的论述中,深刻挖掘种种复杂的现实问题的传统文化思想根源,从具体问题的批判中深入到文化批判。他注意到,在复杂的现实斗争面前,一部分知识分子不能抵抗现实的压力,走向逃避,甚至向往并实践传统知识分子的隐居生活。这正是老庄思想影响下国人的逃避现实倾向。鲁迅反思到,老庄思想“最足以代表知识阶级的思想”^①,是复古反动的现代文人的“祖坟”。“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的私淑弟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与非不想辨;‘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梦与觉也分不清。生活要混沌。如果凿起七窍来呢?庄子曰:‘七日而混沌死。’”^②这种深刻的剖析使得他在一系列的论争中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根柢洞若观火,辩论每击中要害。不仅如此,鲁迅还在小说《起死》和《出关》中,进一步用文艺的形式将庄子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置于两难情境,再次嘲笑了“无是非”观在现实中的尴尬。

郭沫若对老庄的态度与他的政治立场息息相关。在五四时代的热潮中,

^① 鲁迅:《集外集拾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11页。

^② 鲁迅:《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萧伯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32页。

郭沫若对老庄保持了不同于时人的异常冷静态度,他不但在艺术上吸取了庄子的泛神论思想,还赞同老子的自然之道在反抗三代有神论中的历史作用,断定老子的“无为”说是一种不带目的性的积极思想。郭沫若的这种思路,虽异于时人,但也体现了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

但 2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在实际上参与政治生活,他对老庄的态度也随之大变。1923 年郭沫若就创作了讽刺小说《漆园吏游梁》和《柱下史入关》,以此批判了老子的利己、庄子的出世。40 年代后,随着他在政治上的成熟,郭沫若对老庄思想的非实践性、非现实性认识得更为彻底,在一系列著作中对之进行了更为彻底的清算,锋芒所向,直指庄子的“厌世”、“玩世”、“幻想”等反现实的思想倾向,并深入分析庄子逃避反抗而不得最后必定陷入“油滑”的结局。

同样,对于老子思想,郭沫若也一反五四时期的热情赞美,猛烈批评老子的“诈术”、“愚民”,前后的不同直可判若两人。郭沫若对老庄思想立场的变化,并不是他对老庄思想本体的看法有变,而是他的政治立场变化的结果。在 40 年代,郭沫若的政治思想更加成熟,人民本位思想也更加突出,他直言自己批判文化的思想基础,“便是以人民为本位的这种思想。合乎这种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①。因而对老子斥其为“本质上并没有多大的发展前途,因为他没有大众的基础”^②。他分析老子政治思想何以有愚民意识,即在于老子学说是“不以人民为本位的个人主义,必然要发展成为这样的。更进一步,便否认一切文化的效用而大开倒车”^③。

陈独秀是五四时期除鲁迅之外对老庄持激烈批判态度的作家。他对老庄的批判直接针对时代主题而发。陈独秀分析了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④。这种“陈腐朽败”的细胞即是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遂导致我国精神界“强梁敢进之思、冒险敢为之风”从根断矣。^⑤因而,他对包括老庄在内的传统

^①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82 页。

^② 同上书,第 162 页。

^③ 同上书,第 185 页。

^④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9 页。

^⑤ 同上书,第 416、414 页。

文化展开猛烈抨击。

陈独秀的批判指向老子哲学造成中国人的奴隶人格以及老庄的堕落返古。他称老子为“奴隶贩子”，老子主张“知雄守雌，知荣守辱”，是“专务铸造奴隶的模范”。他分析儒家的“圣人之道”为何“不益于世用”，就是因为“宋儒以来之谈孔派者无不逃入于老派乎，静也、虚也、柔也、无为也、无动也，老派之玄妙也，即奴隶之教授法也；鄙夫也、乡愿也、学究也、伪君子也、老派之健将也，即奴隶之志愿地也”。统治阶级正是表面上利用孔子作幌子，背地里却“以老氏之暗毒，吸人血而涸人脑”，使天下人逆来顺受，甘愿为奴隶。故而，愈推崇孔派，吾族之奴隶就愈发不可自拔。^①

五四前夕，在一篇探讨人生真义的文章里，陈独秀对老庄的虚无、保守、堕落进行了批判：“那老、庄的意见以为万事万物都应当顺应自然；人生知足，便可常乐，万万不可强求。”老庄的意见自然使人快活得很，但“人生一世，安命知足，事事听其自然，不去强求，自然是快活得很。但是这种快活的幸福，高等动物反不如下等动物，文明社会反不如野蛮社会。我们中国人受了老庄的教训，所以退化到这等地步”^②。他反复批判：“我们中国学术文化不发达，就坏在老子以来虚无的个人主义及任自然主义。”“虚无主义及任自然主义，都是叫我们空想，颓唐，紊乱，堕落，反古。”^③

陈独秀老庄并非，胡适则扬老抑庄。胡适颇为赞扬老子的“无为”政治，以为主张无为无事的政治，是因为当时的政府太腐败不配有为，偏要有为；不配干涉，偏要干涉，所以弄得“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所以对于那种时势，发生激烈的反响，创为一种革命的政治哲学。对于老子的人生哲学，胡适同样称赞了他的“无为”、“不争主义”。

胡适给老子一个“革命家”的称号，却给庄子戴了一顶“出世主义”的帽子，他对老庄的态度大相径庭。他认定庄子的学说只是一个“出世主义”，这和鲁迅、郭沫若等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庄子对于一切人生寿夭、生死、祸福，也一概达观，一概归到命定。这种达观主义的根据，都在他的天道观念。……

① 《中华民国史料汇编》，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3 年版，第 16—36 页。

② 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25 页。

③ 同上书，第 602 页。

《养生主篇》说庖丁解牛的秘诀只是‘依乎天理，因其自然’八个字。庄子的人生哲学，也只是这八个字”。“这种人生哲学的流弊，重的可以养成一种阿谀依违，苟且媚世的无耻小人；轻的也会造成一种不关社会痛痒，不问民生痛苦，乐天安命，听其自然的废物。”^①“若依庄子的话，把一切是非同异的区别都看破了，说太山不算大，秋毫之末不算小；尧未必是，桀未必非；这种思想，见地固是‘高超’，其实可使社会国家世界的制度习惯思想永远没有进步，永远没有革新改良的希望。……他的学说实在是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大阻力。”^②

闻一多与郭沫若一样，对老庄的认识有一个前后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与他由纯粹的书斋知识分子到关心现实政治的转变相一致，因而他对老庄的立场也经历了本体批评到政治文化批评的过程。他前期称赞庄子对宇宙最高真理“道”的追寻，“有大智慧的人们都会认识道的存在，信仰道的实有，却不像庄子那样热忱的爱慕它”^③。称赞庄子文章思想和文字相交织的美，并发挥庄子“以丑为美”的美学思想。

40年代后，随着闻一多由学者向“战士”的转变，他对道家展开了激烈的批判。

他先从文学史上对老庄进行了批判。在《新文艺和文学遗产》的演讲里，闻一多归纳出封建社会的四种家臣：“第一种是绝对效忠主子的，是儒家，第二种次之，是法家，第三种更次之，是墨家，而庄子是第四种，是拒小惠而要彻底的拆台的，但是因为有前三种人的支持，所以没有效果，后来，由反抗现实而逃到象牙塔中。”庄子居其一，特征是逃避。“在五四，第四种人出塔了，他们要自己管理自己。”这显然是由于时代精神的感召。但“可惜第四种人在塔外住不惯，又回到塔里面去了！”这影射了创作小品文的周作人、林语堂诸人，闻一多批判了他们在新文艺的外表下的复古本质：“他们拼命搬旧塔的砖瓦来造新塔，就如有人在提倡晚明小品，表面上是新文艺，其实是旧的。”“至于文学遗产，就是国粹，就是桐城妖孽，就是骸骨，就是山林文学。”他则针锋相对提出：“现在感到破坏的工作不能停止，讲到破坏，第一当然仍

^①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12 页。

^② 同上书，第 214 页。

^③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2 年版，第 281 页。